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四四期 ——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003d)

---

【千秋功罪】	“继续革命”：对毛和文革的再反省	张博树
【史海钩沉】	回首“文革”说腐败：七十年代也能贪污五十万	王彬彬
【史实辨析】	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	阎长贵 • 杨银禄
【自由论坛】	反思清华百日武斗 ——兼评《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沈 昆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 【千秋功罪】

### “继续革命”：对毛和文革的再反省

• 张博树 •

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毛泽东都是现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歌颂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领袖”，“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批评者正相反，他们把毛视为最大的独裁者，给 1949 到 1976 年间的中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当政者自己的态度则显得暧昧而尴尬：一方面，他们承认毛晚年“犯了错误”，不该搞那场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把毛的画像继续高挂于天安门城楼上，因为毛已经成为这个政权和这个制度的象征，成为这段历史的象征。否定了毛就是否定了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今天的领导人扛不起的一项恶名。

其实，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毛泽东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恶魔，毛和常人一样，也有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但毛注定了要成为人们长久议论的话题，的确是因为毛曾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介入了历史、影响了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赋予了这段历史过多的个人印记。在这个意义上，对毛个人的解读就是对前 30 年“共和国”历史的解读，就是对现当代中国历史中蕴含的种种复杂而诡异的内在编码的破译。

那么，什么东西构成现当代中国历史中如此深刻而又不幸的毛式个人印记呢？我以为，这个东西就是毛本人在世时力倡、并强力推行的继续革命的主张。毛的确是个独裁者，但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敛权之徒。作为共产党人，毛有其独特的社会理想。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夺取政权做一个太平皇帝。他还要奋斗去建设一个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念、又符合中国人“大同”理想的“人间天堂”，并以此为世界人民做出榜样。“继续革命”就是实现毛式“人间天堂”的基本纲领和具体途径。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共产革命的基本主张理解为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逻辑的话，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主张就曾是20世纪50—7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支配中国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特殊逻辑。我们必须把二者做适当的区分，才能更好地厘清这段历史的基本脉络。

首先，根据共产革命的逻辑，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将创造条件，把“革命事业”继续向前推进，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迈向“社会主义”，这是党的纲领中的既定目标。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对这个目标并无分歧，区别只在于有的人主张过渡快一点，有的人则主张慢一点，稳当一点。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同于“新民主主义”的根本所在？简单地说，“社会主义”是要否定私有制，向私有制开刀问斩。这被认为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据。正是依据这一点，共产党迟早要把“保护民族工商业”变成“改造民族工商业”，把土改运动中的“耕者有其田”变成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合作化”。附带说一句，有些朋友认为，共产党40年代给农民土地，只是为了换取农民的支持，一旦掌握政权，就把土地收了回去，纯属典型的欺骗。其实，这是不懂历史才得出的简单结论。在共产党人看来，把亿万农民从小私有者引上合作化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同当年搞土改一样，都是为了实现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法则”。在共产革命的逻辑语境内，这是一个属于ABC级的基本常识。

在政治层面，则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在苏联，这个政权的具体建构被称作“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在中国则被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起初叫“政务院”）。当然，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人民代表”机构和政府机构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它的领导地位是用不着再做什么证明的。党政军一体化而“党”是这个一体化的核心，就是这个有着“共和”之名的“人民”政权结构的实际情形。

可以说，在体现共产革命逻辑一般要求的政治、经济建构方面，中国人开始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明，不过是学苏联，模仿老大哥而已，只是在过渡形式、政权建构的某些方面，有自己的特点。

但毛泽东很快就不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要寻找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

是什么原因促使毛“独辟蹊径”，甚至不惜最终与“老大哥”分道扬镳？延安时代就开始的毛与斯大林的暗中较劲，中共建政后中苏两国民族国家关系层面的复杂考量，毛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现实需要等等，固然都是理解这种分道扬镳现象的重要因素，但它们都不是最根本的。我以为，最根本的是，毛认为苏联版的社会主义变了味，非但建不成社会主义，反倒变成了“修正主义”；而中国共产党照苏联人的样子干，也有变成“修正主义”的危险。

出“修正主义”？理由何在？

毛的担心首先出自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用金钱和物质刺激作为动员手段的反感。毛是个艰苦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革命者，笃信“精神因素”对革命成功的作用，而鄙视人们斤斤计较物质利益。“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还不为了追求待遇而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评级了，反而问题发生的多……”（见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乌有之乡印制，474页）毛特别反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物质刺激强调得过分，认为应该强调艰苦奋斗，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同上，807页）。

对官僚制的反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毛本人骨子里有一种民粹主义的、反官僚反特权的倾向，认为共产党进城后搞等级制、干部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是非常危险的。毛强调干部必须下放劳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毛泽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1963年5月，《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1969年内部学习版，222页）60年代的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可不像现在的领导人下乡搞视察，前呼后拥，做点“亲民秀”而已。四清运动期间，毛、刘等均强调各级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形成制度，“蹲点”期间要发扬老八路作风，吃大锅饭，睡土炕地铺。当时甚至有这样一种四清工作队的编组办法，那就是把省委、地委和县委的干部混合编组，共同工作。（见郭德宏、林小波著《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30、233页）

以上两个方面，又都与毛对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变质问题的警觉有关。毛虽然出身农民，但毕竟比过去改朝换代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眼界高远得多。在某种意义上，他意识到了权力的腐蚀性和执政地位本身带来的危险，尽管他对造成这种危险的根源的解读是完全错误乃至荒谬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详尽的分析，可参考拙作《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和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一文，特别是该文第一节）。苏联的“变修”，使毛看到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蜕变的现实可能。毛不能允许这种情况也在中国发生，不能允许一代革命者的奋斗理念和奋斗成果在金钱、地位和特权的腐蚀下毁于一旦。

但是，还不仅如此。“反修防修”只是毛的思考的一个方面，用来抵制革命意志的衰退；他的思考中还隐含有一个更加积极的、雄心勃勃的方面，那就是建设一种全新的社会和全新的人。正是后一点更加耐人寻味。毛与斯大林不同，斯大林强调“专”，而毛更强调“红”。斯大林只靠秘密警察统治国家、干掉对手，又用物质刺激笼络、收买手下的人。这就不难理解，恰恰是斯大林当政时期，苏联特权体系开始形成乃至膨胀。毛则全然不同。毛有一种诗人气质，有天下情怀和中国农业乌托邦的大同情结。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者，他要搞出一套更加了得的人类乌托邦。这当中，有借此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成分，也有成就前无古人的人类伟业的理想和抱负。毛的唯意志主义的人格特征和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反倒成就了毛的异想天开，成就了他作为中国式共产主义教父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我以为，中共建政后愈演愈烈的党内斗争也要借助这个特殊背景才能获得更深层的解释。比如，“高饶事件”在中共党史上一直是一件扑朔迷离的事情。根据最近出版的一些比较可靠的文献（2008年在香港先后出现两部有关高岗或涉及高岗的研究著作，都提供了不少第一手材料，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一部是曾任高岗秘书的赵家梁和他人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温相著《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明镜出版社出版），高岗在50年代初的跃升、被重用以及后来的“出事”都与当时中共党内高层的博弈有关，而这种博弈不能仅仅理解成是权斗，它确实反映了最高决策层在国家发展战略上的某些认知分歧。前文已经谈到，在共产革命基本目标的理解方面，中共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设定、节奏把握和时间选择上，

党内确实有不同声音。刘少奇主张新民主主义政策要多实行一段时间，以便从经济上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这样，资本家的有限度的“剥削”、农村雇工的存在、甚至一部分共产党员成为富农就都是允许的。这些观点显然已经不符合执掌政权后的毛泽东的胃口。毛的意图是要加快这个过渡，尽早把“社会主义”提上议事日程。而刘的不谨慎（诸如未经毛审阅就下发中央文件之类）又加大了毛的猜忌和不满，毛感到有必要削弱刘的影响，甚至在必要时换掉这个“七大”时已经定下的接班人。高岗不过是毛实施这个意图过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至于为什么是高岗而不是其他人充当了这个工具，这也很简单：一方面高与毛成长环境相似、受党内对手迫害的经历相似，高对毛充满崇拜，毛也很器重高（赵家梁的书对此有分析，见该书108—111页）；另一方面则是在认知和社会政策方面高有意识地向毛靠拢，比如高还在主持东北局工作时，就站在毛的一边，鼓吹发展“互助合作”的必要性，反对党员雇工，自然受到毛的青睐（见温相书，379—383页）。高后来“翻船”，则是这位草莽出身的领袖不懂政治深浅、自以为在贯彻主席意图反而“帮了倒忙”、最终稀里糊涂地成了党内斗争牺牲品的结果。

1959年拿下彭德怀，也不容忽视毛式乌托邦战略被挑战的大背景。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但彭大将军批评大跃进“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却触到了毛最敏感的神经（彭的原话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02—103页）毛要成就的是改天换地的伟业，即便有缺点也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毛可以自己承认有误，但绝不允许别人质疑这个伟大工程。于是，彭一定要被整肃，庐山会议也从纠“左”变成了反“右”。三年大饥荒迫使毛接受某些政策调整，但也仅仅是暂时的。“分田单干”的主张超越了毛的底线，因为这和他要建设的新社会完全背道而驰。毛把此类动向解释为被推翻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企图“复辟”，开始在各种场合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四清运动揭露出来的大量党内贪腐问题使毛确信有相当比例的基层政权已经“烂掉”，“领导权已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更重要的是，出于接受苏联“变修”的教训，毛提出中共上层是否也有“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的问题，并越来越倾向于作出肯定的回答。顺带说一句，很多朋友在解释60年代的毛、刘冲突时，总是把它归结为纯粹的权力之争。在我看来，这至少是不准确的，甚至是很肤浅的。认真检视那段历史不难发现，刘从未对毛构成篡权意义上的真正威胁；即便有这种威胁（毛的心理上似乎曾经有这种幻觉），毛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之，大可不必兴师动众。问题的关键在于，毛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党、整个官僚机构、整个国家都出了毛病，而且是致命的大毛病。可以说，下决心除掉刘少奇，既有毛巩固个人权力、避免像斯大林那样死后被人清算的考虑，也有孤注一掷，推进毛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拯救党，重构党、国家和社会的冲动。至于一定要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当然是毛作为独裁者和党内“老大”冷酷、残忍的铁证。也是这个党、这个体制一个极其糟糕的传统（人们不会忘记高岗、彭德怀被整肃后，也都莫须有地被指责为组织“反党联盟”或“反党军事俱乐部”）。就毛个人而言，这个湖南山沟里走出来的革命者性格上的缺点、怪癖，成为政治领袖后心理上的变化，晚年猜忌心理的加重，被排挤乃至被监视的幻觉等等，均赋予毛与他的对手（真实的对手或臆想中的对手）的斗争更加晦暗、更加扑朔迷离的性质。这些足以构成一篇单独的文章去探讨。

然而，我还是要说，和毛要成就的“伟业”相比，这些都不过是枝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毛的“继续革命”到底要成就哪些东西？它在实践上又意味着什么？导致了什么结果？

“继续革命”理论的正式提出是在文革开始不久的1967年（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正式把毛发动文革的理论称为“继续革命”理论。需要指出的是，毛本人并没有刻意使用过“继续革命”这个概念)。它的内容及其理论要旨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 (1) 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
- (2)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 (3) 这个斗争本质上仍然围绕着政权进行；
- (4) 斗争必然反映到共产党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
- (5) 必须通过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引向深入；
- (6) 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从今天的眼光看，这套“继续革命”的“理论”最值得注意的是两点，那就是毛所谓的从“走资派”手里夺权和“要斗私批修”。前者我们可以称为政权革命，后者则可以称之为心灵革命。

先来看政权革命。毛既然认定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相当比例的政权已经“烂掉”，那么“彻底打碎”旧的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制度和机构，“创建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见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种“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应该体现“巴黎公社原则”，体现“群众的首创精神”，体现真正的“人民民主”。1967年初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和随后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似乎满足了以上要求，所以一度得到毛的赞扬和肯定。1967年2月3日《红旗》杂志甚至发表社论称赞这一壮举“自下而上地发动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打碎旧东西，创立新形式，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见1967年2月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心灵革命则触及毛式继续革命更核心的领域。前文谈到，毛鄙视物质刺激，担忧革命者蜕变为只贪图个人享受的小布尔乔亚和蝇营狗苟的经济动物。毛的解决办法则是强调“精神”，强调“突出政治”，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相信“精神可以变物质”。中苏论战时中方对南斯拉夫“铁托修正主义集团”和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指责之一就是“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见“九评”中的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毛则强调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强调“向解放军学习”，大抓“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甚至主张在厂矿企业普遍设立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毛说“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引自毛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批示。1963年12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则干脆把他所主张的心灵革命高度概括为“要斗私批修”。毛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78页）

那么，毛的政权革命和心灵革命成功了么？有可能成功么？当然不可能。

现在已经掌握的大量材料证明，“上海一月风暴”式的“直接民主”，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人民民主”，而只是得到毛的支持与庇护的恩赐民主（文革开始时上海出现的工人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确有自发性，上海市委也根本未予承认。这本来符合中共极权体制的一贯传统。如果不是张春桥领会毛的文革意图，当机立断同意了“工总司”的要求，而这个

处置又得到毛的首肯，就不会有工人组织的合法化和后来随之发生的“上海一月风暴”。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民主”是恩赐民主，而不是正常法治条件下，以公民权利不可剥夺为前提的民主）。毛的确曾经试图靠这样的“民主”把他的民粹主义直接外化、形象化甚至制度化，找到一种保证“人民公仆”不变质的“全新的政权建构形式”，用心可谓良苦。但“革命”的演变进程本身却迅速打破了毛的梦呓。各地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群众造反组织无不热衷于“夺权”，其中既有对原来掌权者和官僚体系的憎恨，也有突然迸发的、对可能到手的权力的垂涎。派性纷争，狼烟四起，人性的善恶竟然突然间搅在一处，难辨良莠。为了维持基本秩序，毛不得不从他的“理想”退却，转而支持有解放军和“革命干部”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后来又把“革命委员会”从“临时权力机构”变成了常设机构。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革命委员会的出现，一方面有群众组织参加，使得‘文化大革命’所标榜的‘目标’和‘理想’有了自圆其说的解释；另一方面，有党的干部参加，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可以保证新政权能正常地运转；最重要的是有解放军的支撑，可以有效地控制住‘革命秩序’，使‘文化大革命’能够真正按照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把革命委员会看作是政权重建的唯一适当的组织形式了。”（张志明著《走出迷谷：1967—1979年中国政体变革的历程与思考》，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73页）

然而，革命委员会建立的同时又是旧体制回归的开始。由于“大乱”之后走向“大治”的现实需要，越来越多被“解放”的老干部回到领导岗位上来，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则影响日衰；军队在“三结合”的权力结构中原先占据的支配地位也随着各地政府机关中党委的恢复而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政权机构的军事管制的色彩日益淡薄。到了1972年，向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旧体制的回归已成定局。

这里必须指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不管毛泽东怎样号召“天下大乱”、“造反有理”，他却从来没有把执政党的蜕变、党员的特权化和官僚化等问题与这个体制最根本的弊害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权问题。这是毛本人的思维禁区。他既不允许别人、也不允许自己触犯这个禁区。禁止别人质疑一党专权是因为此系共产党执政的命脉所在；禁止自己质疑这个问题则是因为毛本人就是这个体制的最高代表者，这里既有他的理想，也有他的利益。毛可以痛恨官僚机构，可以把原有的这套机构推翻重来，但他从来没有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一元化的党专制体制本身。文革初“上海公社”刚成立时，毛就曾仔细斟酌这个新的权力机构的名称，最终还是否定了它。毛的理由之一竟是：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总得要有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参见同上书77页）

当然，这个“核心”与其说是“党”，不如说是毛本人。这是独裁体制的必然结果。独裁者自己也必然因此遇到麻烦，而使他建构“新的权力形式”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地方政权的情形已如上述。在中央决策层，“九大”时毛不顾林彪的反对一定要立林为新的“接班人”，随之不久两人之间即发生矛盾；林立果的“5·71工程计划”最终把林彪送往西天，毛也因为这个巨大的打击精神几乎被摧毁。“十大”又推出一个娃娃蛋子王洪文，这是毛自己成为他所鼓噪的阶级偶像化的俘虏的一个证明。但王洪文这样的文革新贵干不了实事，毛不得不把已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从江西农村召回来顶替日渐虚弱、病入膏肓的周恩来。保卫文革的精神遗产和理顺现实的生产秩序成为晚年的毛无法释解的矛盾，毛只能在代表复旧势力的邓和体现文革“理想”的极左文人集团“四人帮”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骤起、周恩来的辞世和四五事件的发生，这个“平衡”到底被打破了，邓小平再次被废黜。毛的生命之火也在文革的黄昏暮色中耗尽，再也没有力量重展“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一代雄风了。毛临死前留下的一个近乎家天下的小班子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猜想（在毛临去世前的中央决策班子中，毛夫人江青、毛的侄子毛远新都是重要角色，尽管后者名义上只是毛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网上甚至盛传毛有若干“遗嘱”，要立江青

或毛远新为毛去世后的党的领导人。这些都是传闻，不足为据。毕竟毛已经选择了华国锋出来支撑局面，哪怕是过渡性的)。我倒以为，即便毛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狭隘(在没有可信的第一手材料证明以前，我个人的确更愿意做这样的假设)，他在文革中后期“接班人”问题和最高权力建构方面遭遇的尴尬，也已经对他的政权革命的勃勃雄心构成了绝妙的讽刺。

一切都是这个体制惹的祸，可惜毛至死也没能明白这一点。

现在再看毛的心灵革命。应该承认，毛的灵魂革命中隐含着非常深刻的东西，这是浅薄的自由主义者通常忽视或干脆视而不见的。当毛断言“人应该有一点精神”，经济的发展不应该以道德的退化为代价(毛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命题，但毛的“反修”逻辑明显包含这层意蕴)时，毛的确拥有某种思想者的气度；然而，作为实践者和行动者的毛走得更远，他试图用他的乌托邦计划挑战人性，挑战“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亘古不变的人类经济行为铁律。200年前的卢梭曾讲：“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见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卷第7章)法国大革命的先知们也的确试图把这种野心变为现实。但法国还是小了点；雅各宾当政的历史也实在短了点，没有来得及体现革命的巨大建构功能，社会进步的可设计性，“公意”的不可分割和“完美社会”的无比感召力。毛则要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实现这一切。不要忘记，这可是在一个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进行的、有数亿人口参加的、延续了10年之久的、规模空前(且肯定绝后)的巨大实验！

毫无疑问，实验遭到了彻底失败。最简单的理由是：中国人也是人，千百万有日常需求、有牟利动机、有发财渴望的普通人。伟大而荒唐的造神年代可以激起人们一时的“革命”热情，但现实生活是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存在。人的经济行为本性会顽强地表现自己，本能地抵制那个意识形态的童话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福、杨水才式的革命苦行僧不可能维持长久。当然，毛也并非全然不知这一点。他明白同私欲和“小生产者的自发性”的斗争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连马克思还承认“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仍会保留某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呢！文革后期姚文元、张春桥各有一篇十分著名的文章，都是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姚文元文章的标题是《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刊载；张春桥的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刊登)姚的文章引用了毛的“最新指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姚继续发挥这个“限制”主题：“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张文则以“苏修”为例，描绘了这批“新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上台的后果：“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应该说，这些文章比较准确地传达了毛本人的所思所想，毛最担忧的确实是这些东西哪一天真的成为现实；姚文和张文甚至有某种前瞻性或预见性(这个问题，后文适当场合还要分析)，但在一个“革命”了太久的语境中，在一个以普遍贫穷为标志的社会中，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远离“特权”，甚至远离“正常生活”，期望“正常生活”能够早些回来的普遍社会心理氛围中(这种心理虽然不能公开表达，但早已心照不宣)，上述论调反倒显得那样“空”，那样不着边际，那样令人反感甚至厌恶。在此类文章盛行的年代，笔者已经进了工厂，在北京一家国营企

业当工人，也是厂“工人理论队伍”的成员，没少学习马恩列的“33条语录”（指有关机构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33段话，《人民日报》1975年2月22日发表，是当时各单位必须组织“学习”的“重要文献”），对此类意识形态的喧嚣和现实生活间的反差深有体会。再伟大的乌托邦也有落幕的时候。当社会普遍心理早已厌倦没完没了的毛式革命“激情”而更欢迎邓式“复旧”努力时，张、姚的文章不过是为这个巨大乌托邦工程的黯然退场奏的挽歌一曲而已。

总之，毛对“社会主义新路”的寻求遭到了双重失败，既是新的政权建构努力的失败，也是毛憧憬的心灵革命的失败。

问题还不止此。毛的“革命”是一种双重扭曲：一方面，基于共产革命的基本理念建构的斯大林式政治经济结构（庞大的党政官僚体系和计划经济制度）本身就是对制度现代化逻辑的背离和扭曲；毛的文革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则是对这种扭曲的再扭曲（尽管毛的本意是想纠正和超越它）。毛的“大民主”确乎更加激进，毛的“要斗私批修”也确乎更加“圣洁”，但所有这些“超越”和非特权化、非市场化、“纯洁化”和“革命化”的努力不但更加远离制度现代化的基本逻辑，而且用一种加倍荒唐和畸形的形式把共产革命深藏的理论悖谬凸显了出来，也就是，关于人，人的经济行为本性和政治行为本性的马克思主义误读，关于革命先知们对“阶级”、“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误读，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共产革命逻辑自身的虚幻性和乌托邦性。（这个问题，本文不可能深入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作《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1卷的第4章。）

显然，历史已经走到必须改弦更张的那一点。

□ 节选自《“共和”60年——关于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

~~~~~

【史海钩沉】

回首“文革”说腐败：七十年代也能贪污五十万

• 王彬彬 •

“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是国内国外许多人都感叹的事情。“文革”在中国，这不用解释。“文革学”在国外，则是说，对“文革”的资料收集、整理，对“文革”从各个方面进行的研究，海外不少相关机构，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在海外，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关于“文革”的书籍问世。而在祖国大陆，对“文革”的研究可谓还未真正开始。我们自己不产生研究“文革”的书，海外研究“文革”的书，一般人也看不到。对于“文革”，人们是越来越无知了。

在对“文革”越来越无知的同时，是对“文革”的越来越美化。这些年，美化“文革”的言论时有所见，几乎成为一股潮流。在电子网络上，这种潮流表现得最明显，甚至愈来愈呈汹汹之势。说“文革”时期有着真正的“民主”，是时常听到的一种言论。“文革”开始时，我也开始记事。我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对“文革”，我总算还有些切身了解。而对“民主”，我也不妨说有些基本的理论知识。说“文革”期间有真正的“民主”，对我来说，就等于说冰雪池中有荷花灿烂，火焰山上有玫瑰飘香；就等于说一条泥鳅在放声高歌，一只盐水鸭在展翅飞翔。这种说法因过于荒谬，迷惑性还不算太大。而另一种美化“文革”的言论，迷惑性就要大得多。



“文革”期间是没有腐败的，“文革”时期的官员都是很清廉的，“文革”是“最本质的反腐”：这就是那种更具有迷惑性的言论。腐败源于权力的不受监督和约束。如果说，在“文革”前，权力没有有效的监督和约束，那在“文革”时期，造反派夺得了权力后，这权力就更不被监督和约束了。判断腐败严重的程度，主要不是看官员受贿的绝对数额有多大，或者说，主要不是看权钱交易的绝对“交易额”如何，而要看社会普遍的物质生活状况与受贿金额、与权钱交易的“交易额”是一种怎样的比例。数百万元的腐败案，今天已司空见惯；数千万元的受贿，也不能让人有丝毫惊讶。超过亿元的权钱交易，这几年也数度见闻。这种规模的腐败，在“文革”时期当然不可能普遍。这首先是因为“文革”时期整个社会在物质上都是极其匮乏的。一群强盗闯入一贫困之家，将室内最后一枚铁钉都拔走，但全部所得也不过几百元；另一群强盗闯入一富豪之宅，只拣黄金美玉等值钱的拿，一般东西则看不上眼，但全部所得也有数十万元：你决不能在这两群强盗之间分出道德上的优劣；你决不能说闯入贫困之家的强盗因只抢得数百元，便在道德上比闯入富豪之宅的强盗高尚千万倍。而在一定意义上，“文革”期间的腐败官员，就像闯入那贫困之家的强盗，而今日的腐败官员，闯入的则是富豪之宅。

“文革”期间，我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我的记忆告诉我，“权钱交易”在“文革”期间是普遍存在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的，是“文革”后期一位公社副书记对我父亲说过的一番话。他说：“要办事情，就要学会送东西。送他东西，难道是在疼他？还不是在疼自己！”这番话令我父亲有醍醐灌顶之感。办事情要“送”，这一点我父亲当然早已懂得。但“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父亲此前似乎一直没悟透。“还不是疼自己！”——那时在公社中学教书的父亲，以为这真是至理名言。一般人，在行贿时，多少都有一点心理障碍，尤其刚开始干这种勾当，事前事后，心里都会很别扭。但“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行贿的心理障碍、消解行贿的心中别扭。有位小说家前几年写了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名为《启蒙时代》。如果把让人对任何一种道理的懂得，都视作是“启蒙”，那么，在“文革”期间懂得了“还不是疼自己！”的父亲，也可谓是被这位公社副书记进行了“行贿启蒙”。被“启蒙”的父亲，此后多次以赞赏的口气对我讲解着“还不是疼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文革”期间就接受了“行贿教育”的。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父亲对“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的鹦鹉学舌，在某些人生关头，总在我耳边响起。但因为心中的障碍和别扭过于坚固和强烈，“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都被我以“我可以不疼自己！”所抵挡。如果说对他人的“送”，是因为要“疼自己”，那么，我不“疼自己”不就完了吗！然而，前些年父亲重病，从这家医院转到那家医院，我也就给这个医生送完红包，又给那个送。这时候，耳边响起的是这样的声音：“你可以不疼自己，但你却不能不疼自己的父亲！”我想，我可以拿自己的名利赌气，却不能拿父亲的生命撒野。——这样想后，便硬起头皮，怀揣信封去找医生。每一次，都不像是去“送”，倒像是去“偷”。从“还不是疼自己！”到“我不能不疼父亲！”，说到底，还是“文革”期间接受的“行贿教育”在起作用。

“文革”期间城市的情形，我没有切身感受。但城市一定有城市的腐败方式。在农村，那时候，县以下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政权”。农民们每天面对的是生产队的队长。队长，在那时候的农村，是有着极大权威的。生产队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说了算。一个本来还算老实本分的人，当起了队长、掌握了统御全队的绝对权力，就会变得骄横起来。而再刚烈的人，在队长的威权面前，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因为队长“官”虽不大，却有整个国家的“专政机器”在为他撑腰。敢与队长较劲，敢违队长之命，就意味着是在对整个国家政权挑战，最终，肯定成为“阶级敌人”。我所非常熟悉的那个生产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矩”：任何一家来了客人，都要请队长陪客；甚至家里有了匠人，也要请队长作陪。来了客人，家里有了匠人，桌上的菜当然要好一些。所谓请队长来“陪”，当然是请他来享用这自己也舍不得动筷的好菜。这队长还不是“队长”时，是滴酒不沾的。当了队长后，硬是让家家户户“请”成了一个酒瘾极大者。酒瘾极大的队长，每喝必醉。醉了则大发酒疯。那时上海产的“飞马牌”香烟，是仅次于“大前门”的好烟。队长在醉后，往往嘴里叼着“飞马”，将一个汉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颤动

着，叼着烟的嘴，连声喊着：“飞马、飞马……”有时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请他来吃喝的人。每当这时，最兴奋的是孩子们。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娱乐。

最初，是有人为巴结队长而请其“陪客”。有人开了头，别的人家就得跟上。当绝大部分人家都有客必请队长陪时，那最不情愿的人家，也不得不遵从已然形成的“规矩”。得罪了队长，那就等于穿着湿衣服过日子，没片刻舒服。队长要找你的茬，那太容易了。一次，一群孩子，手里拿着种棉花的小铁铲，走在田埂上。他们玩的是捉黄鳝的游戏，这是一种古老的游戏，一代代孩子都玩过。他们还没有动手，队长远远望见后跑了过来，将其中一个孩子手中的铁铲夺下，扔进不远处的池塘；又屈起两指，在这孩子头上敲了两个凿栗，然后扬长而去。走了几步，回过头说：“田坝都让你搞坏了！”不理睬其他孩子，只对这个孩子下手，令所有的孩子都一脸惶惑。这孩子回家后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默然不语。父亲知道，一定是在某件事上得罪队长了。

父亲想的当然不是找队长讨说法。他想的是以怎样的方式赔罪。只在孩子身上撒气，说明得罪得并不严重，要赔罪该不难。下次请队长陪客时，多敬几杯酒也就可以了。可怜的农民们，请队长吃饭，当然也是一种贿赂。这是一种“权吃关系”。这种“权吃关系”，确实与今日惯见的腐败大为不同。从“请吃”的农民角度说，以这种方式向队长行贿，并不是为了从队长那里得到什么，而是为了不得到什么：不得到骚扰、刁难、迫害。从“吃请”的队长角度说，以这种方式受贿，作为回报，不是要为对方做什么，而只需不对对方做什么：不在集体干活时对对方家的人鸡蛋里找骨头，不在派工时刻意为难折磨对方家的人，不在对方的孩子和女人身上动粗……行贿而仅仅是为了避祸，这可以称之为防御性行贿。这种防御性行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但在“文革”期间却普遍得多。

其实有许多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揭示过“文革”期间的腐败。1979年问世的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的“文革”期间的腐败现象，不也堪称触目惊心吗？王守信，一个县燃料公司的经理兼支部书记，从1971年11月到1978年6月，贪污了五十余万元。那时候，月薪五十几元，就是高工资了。五十余万元，也相当于今日的数千万元吧？贪污来的钱，王守信并没有都落入自家腰包，相当一部分用于向上级部门行贿。王守信利用权和钱，编织了一张腐败之网。这也说明，腐败，在那个时候，也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同样是1979年问世的高晓声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也让人看到“文革”期间的官员是怎样对百姓巧取豪夺的。今天的一些人，他们之所以认为“文革”期间没有腐败，是以为那时的“群众造反”是有效的反腐方式。这真是天大的误会。“造反派”在夺得权力后，在敛财渔色上往往更肆无忌惮，更穷凶极恶。“文革”期间的“群众造反”，本质上也是一种阿Q式的“革命”。阿Q如果以“造反”的方式成了未庄的主宰，他将怎样夺取财物和女人，已由他自己做了预告。而“文革”期间以“造反”的方式夺得了大大小小的权力者，正是大大小小的“革命”成功的阿Q。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中的王守信，就是靠“造反”起家的。小说《李顺大造屋》中的那个公社砖瓦厂的“文革主任”，也是靠“造反”夺得权力的。如果说王守信到1971年才开始他的“贪腐事业”，那《李顺大造屋》中的这个“文革主任”，则是一朝权在手，便把利来谋了。为了让那些美化“文革”的人明白那时候的“造反派”是什么货色，我还是照抄小说中的几段：

李顺大想得太落后了，在文明的时代里，文明的人是无需用那野蛮手段的。有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在光天化日之下，腰里插着手枪，肩上挂着红宝书（引按：“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今天一些歌颂“文革”的后生，恐怕未必知道。）由生产队长陪同，到李顺大家做客来了。原来他是公社砖瓦厂的文革主任，很讲义气，知道李顺大要造房子买不到砖，特地跑来帮助解决困难。他大骂了一通走资派刘清不替贫下中农谋利益，现在则轮到他来当救世主了，只要李顺大拿出二百一十七元钱来，他负责代买一万块砖头，下个月就可以提货。这话说得分外漂亮，原是值得怀疑的。但李顺大却认为，彼此都住同一大队，虽然没有交情，也三天两头见面，从

前也不曾听说过这人有什么劣迹，现在出来革命，总也想做点好事，不见得马上就骗人。况且又是生产队长同来的，还有枪有红宝书，真是讲交情有交情，讲信仰有信仰，讲威势有威势，李顺大虽然当过三次逃兵，还没有经过这种软硬兼施的场面，心一吓，面一软，双手颤颤数出了二百一十七。

到了下个月，大概本来是可以提货的，想不到李顺大交了厄运，被公社专政机关请去了，要他交代几件事：一、你当过三次反动兵，快把枪交出来；二、交代反动言行（例如他说过“楼房不及平房适用，电话坏了修不起”的话，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后来的事情就不用说了，那是人人皆知的。他自己出来后也没有多言。不过有两点颇有性格，第一是他吃不消喊救命的时候，是砖瓦厂的文革主任解了他的围。作为报答，事后私下商议从此不再提起那二百一十七。第二是关押他的那间房子造得相当牢固，他平生第一次详细地在那里研究了建筑学，对自己将来要造的屋，有了非常清楚的轮廓。

从“土改”时始，李顺大的全部生活目标，就是造几间属于自己的屋。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节俭，到“大跃进”开始时，备齐了可造几间房子的材料，却都被充了公：砖头被拿去造炼铁炉，木料被拿去制推土车。“大跃进”过后，李顺大开始了新一轮的节俭。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李顺大不再积攒实物，只是储蓄现金，等到钱备齐了一一下子把材料买来，马上造屋。一分、二分地存；一角、二角地蓄。到“文革”开始时，李顺大又备齐了可造几间屋的钱，却什么也买不到了；却买什么都要“走后门”了。用小说中的话说，那时，许多生活必需品，都是“大官送上门，小官开后门，老百姓求别人”。正是看到了李顺大急于造屋却买不到材料，那个砖瓦厂的“文革主任”才用亦骗亦抢的流氓手段，从李顺大手中弄去了那笔买砖的钱。“文革主任”钱到手后，便串通公社“专政机关”，对李顺大关押拷打；待到李顺大“吃不消”时，他再来“解围”。这样做，就是让李顺大从此不提钱和砖的事。

在生活必需品紧缺的年代，送上一定分量的这类物品，往往就是有效的贿赂。粮食、鸡蛋、食油、老母鸡这样，是我们那里农民“文革”期间用于贿赂的主要东西。送人母鸡的情形比较少。母鸡被称为“小银行”。在那年代，农民的日常开销，都指望着母鸡生蛋。尤其是每日都必不可省的吃盐和点灯，要完全靠卖鸡蛋维持。每个大队的小卖部，代国家收购鸡蛋。那时候，国家收购农民的生猪和鸡蛋，多多益善，据说是拿去换外汇。农民自家养的猪，是不能随意宰杀的。杀自家的猪，像后来多生孩子一样，要有“指标”，要先期获得批准。在获得“指标”的同时，要向国家交税，所以农民都把这叫做“裁税”。要杀猪须先“裁税”。不“裁税”而杀猪，公安局就会来抓人。其实，农民杀猪，是并不卖肉的。总是家中要办婚事，才申请杀猪指标。婚事都定在腊月里，逼近年根时办。农民家里，通常都只养一头猪，多了没东西喂。正月里把小猪买回，腊月里卖出。年底要办婚事的人家，则老早就开始争取年底杀猪的指标。我所非常熟悉的那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每年腊月也就一家人家杀猪。

自家养的猪，必须卖给国家，价格由国家定；自家养的猪，经批准后，杀了，要给亲戚们送点肉，余下的，就留着办喜事和过年，并不卖出一两，却仍然必须向国家交税——于此也可看出那时国家是怎样剥夺农民的。杀猪没办法瞒人，所以国家可以控制。我相信，如果吃鸡蛋国家也能控制，那时也会控制的。但实在无法制定一项禁止农民吃自家鸡蛋的法令。所以农民如果把自家的鸡蛋都留着自家吃，并不卖给国家，国家也无可奈何。但实际上，农民是很少吃鸡蛋的。来了客人时，会蒸个鸡蛋羹，那也是一个鸡蛋加上一碗水。我一直纳闷的是，国家那时在我们那里收购鸡蛋，是不论斤而论个的：无论大小，一律六分钱一个。那时，火柴二分钱一盒；食盐一角五分一斤；煤油三角五分一斤；猪肉七角三分一斤；最便宜的香烟，八分钱一盒。六分钱，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吃一个鸡蛋，就等于吃下六分钱啊，人们怎么舍得？鸡蛋是母鸡所产，所以农民也不会轻易用母鸡送礼。但在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求人时，也会送上

两只母鸡。接受母鸡的人家，也并不吃，而是养着，让鸡下蛋。送母鸡虽不是送现金，但也相当于现金了。在一般情况下，农民求人办事，是送上一篮子鸡蛋、一担稻子、数斤菜油。在食物紧缺、营养普遍不良的年代，其价值，也不亚于今日厚厚的一个信封了。

1982年问世的路遥的小说《人生》，其中的主人公高加林，本来是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后来被大队支书的儿子所取代。高加林因此痛不欲生。小学是大队的小学；大队是支书的大队；民办教师的报酬由大队支付，也就是由支书支付。大队书记的儿子要当民办教师，普通农民的儿子高加林当然就只能让位。那时候，城市知青被称为下放知青，农村的孩子读完初中或高中后被称为回乡知青。下放知青日思夜想的是“上调”，即到城里工作。对于回乡知青来说，能在大队小学当个民办教师，就是很幸运的事了。如果能在公社中学当个民办教师，那就是天大的幸运了。要能有如此好运，就要向有权决定此事者“送”。往往是要送许多次，才有可能如愿以偿。如愿以偿后，并不能就不再“送”。有权给你这职位的人，也能够随时请你卷铺盖走人。为了保住这职位，就得持之以恒地“送”。回乡知青多而民办教师的职位少，那就看谁家“送”得多“送”得勤了。参军，也是那时农村青年的一条出路。要能穿上军装，当然也得“送”。虽然那时是普遍穷困的，但也有比较宽裕和更为寒窘之别。只有那种比较宽裕一点的人家，才有可能“送”。因此，当民办教师、参军一类事，是与那种寒窘之家无缘的。寒窘之家可以没有非分之想，但却免不了会有人生病。一有人生病，也就得破些额外之财。那时农村有所谓“赤脚医生”，一个大队一个。现在有些人对“文革”时期农村的“赤脚医生”大唱赞歌，是十分可笑的。“赤脚医生”本身是农民，只懂得一点非常皮毛的医学知识。他们往往是从泥田里上来，背起药箱就去给人看病治病。如果能够做严格的统计，“文革”期间“赤脚医生”治坏了的人，肯定比治好了的人多；治死了的人，肯定比治活了的人多。我以为，“赤脚医生”完全是反智主义的产物，体现的是对科学的极端蔑视。“赤脚医生”上门诊治，理论上是毋须付诊费的。这也是现在有些人歌颂“赤脚医生”的一个理由。但实际上，却并没有这么清白。我所很熟悉的那个“赤脚医生”，因为懂得了一点卫生知识，知道有些病会传染，所以从来不碰人家的茶碗。他到人家家里来，也就是送个药、打个针，几分钟的事，却必定要吃人家一些东西。通常的情形是，在他来时，一碗面条已经煮好，上面再加一两个鸡蛋。待他拿完药或打完针，就把面条端上。他也毫不推辞。坐下、吃完、走人。如果不这样招待，下次要请他，就难了。我每看见他并非吃饭时间在人家家里慢条斯理地吃饭，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令这个大队所有人不解的是：他嫌人家茶脏，怎么就不怕人家饭脏呢？

“文革”期间，大队开始有了手扶拖拉机。当手扶拖拉机买回时，颇引起些兴奋和议论。这是那时农村拥有的最现代化的东西了。“文革”期间，每个大队都办起了所谓“林场”。

我们那里并非林区，充其量有些丘陵。办林场的目的，我以为其实是为了把分散在生产队的下乡知青集中起来，由大队统一管理。下乡知青分散在各生产队，问题太多。而要把全大队的下乡知青集中起来，就得有个依托。林场，就是这样一个依托。全大队的下乡知青都集中到林场，大队派一个人当场长。这实际上是把下乡知青与贫下中农相分离。林场里的知青，在场长带领下，除了种树，也种些瓜果之类。当大队有了手扶拖拉机时，大队书记便派拖拉机，把林场出产的东西，一车一车地往公社书记家拉。那时，大队也没有什么集体经济，弄台拖拉机，其实是没什么用场的。用它来送礼，就是最大的用场了。

1984年问世的阿城小说《棋王》，其中的上海知青倪斌，为了能“上调”到地区文教部门，把祖传的一副明代乌木棋送给了地区文教书记。这还不够，倪斌还写信回家，叫寄些字画来。说“文革”时期没有腐败的人，其实只要去问问那时的下乡知青，就会知道自己有多么荒谬。下乡知青日间思、夜里想的，是“上调”。“上调”的名额非常紧张，竞争是很激烈的。要得到这宝贵的名额，就得“送”，就得比别人多“送”。至于女知青，有时还得把自己的身体向那手里有名额者“送”。女知青被糟蹋的事，其实也有许多文学作品写到了。即便不是为了“上

调”，即便仅仅是为了平时所派的活轻一点、所受的待遇好一点，也得“送”。家庭条件好一些的知青，可以常常请假不出工，就因为“送”得多。尤其是可以三天两头回家。如果每次从家里回来，都能“送”上可观的孝敬，当然是回得越多越好。我见过“下乡”几年却几乎都住在城里的知青。每年来一两次，住几天又回，却比别人更快地“上调”了。那原因，是尽人皆知的。

1972年，福建莆田的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知青在农村的生活状况。这是“文革”期间的著名事件。李庆霖信中说：“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然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说“文革”期间没有腐败的人，为“文革”大唱赞歌的人，动辄说别人把“文革”妖魔化。难道他们不知道李庆霖“告御状”的事？难道他们没有读过这封信？李庆霖就是吃了再多的豹子胆，也不敢对毛泽东说谎吧？

对“文革”的美化之所以几乎成为一种潮流，原因是多样的。这里难以细细分析。只说一点，那就是“文革”的真相被揭露得太少。歌颂“文革”的言论享有无穷的空间，想怎么歌颂就怎么歌颂；揭露“文革”、批判“文革”，总是受到限制、压制。——那些对现实不满的“文革”歌颂者，至少应该感谢“现实”给了他们尽情歌颂“文革”的自由吧？

□ 摘自《随笔》

~~~~~

#### 【史实辨析】

##### 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

• 阎长贵 · 杨银禄 •

多年来通过网络流传着这样一则材料，其内容是：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师，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

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摘自《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

对这则材料我们不大相信，认为是编造的，也核实过，但没有公开澄清。不过迄今不断有人问我们这件事情，前不久，《炎黄春秋》编辑部转来河南开封薛开震先生2009年11月18日的一封信，该信说：“……几年前，我看到此资讯（按：张玉凤披露的毛泽东身后常委名单），便判断是真的。后来，辛子陵先生在《文革黑匣子解密》一文中详细引用张玉凤的回忆，并认为确有其事。然而，这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尚需获得更多的证实，张玉凤的披露只是孤本。目前最佳的办法，就是请您（指阎长贵）于方便之时电话询问一下毛远新先生，甚至到南昌去面见一下也是必要的……我以为毛远新也应当坦诚直面这个事实的。”

诚如薛开震先生所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对研究“文化大革命”、还原“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目，非常必要，务需辨明查清。读者的恳切心情，也强烈要求和促使我们尽自己能尽的一点责任。

前几年，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商量问问汪东兴同志。这份材料我们从网上下载后寄给了汪延群同志（汪东兴的女儿）。此后，杨银禄在2008年1月13日下午给汪延群打电话询问，汪延群说：“我看过你说的这份材料，并问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说：‘没有那些事，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其目的是诋毁毛主席。’如果是真的，整理的材料也不会叫个人保管，要交中办秘书局保存。这是规矩和纪律。”

汪延群还说：“问了我爸以后，我又问了张玉凤，她说：‘没有那些事，当时（按：“当时”，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笔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对别人写的东西对与不对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认为是真的了。我是不会透露中央内部机密的。’”

2010年1月31日下午，关于这件事，阎长贵又打电话询问了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文字根据来！”毛远新还说，我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谣言多了，很多人这样说有什么办法。

核实表明，这完全是一篇编造的谎言。

□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3期

~~~~~

## 【自由论坛】

### 反思清华百日武斗 ——兼评《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 沈 昆 •

#### 一、引言

唐金鹤学长的书《倒下的英才》面世了，对于唐学长自然是可喜可贺的大事，对于关心清华文革的人们也是值得记录在案之事。为唐学长的这本书，在清华校友中颇以反思文革著称的

陆小宝校友写下了洋洋近两万字的序，断言唐学长此书，“以一个工程师的方式”，“复原了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唐学长的《倒下的英才》究竟有没有复原了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还是流于评书般的戏说抑或恫言排测，甚或是撕开人们旧日的伤口往上撒盐，本人尚未见到书，自然无从评论。

陆小宝校友的序（见本刊 z k 1 0 0 1 b ——编注），倒是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洋洋万言之中确实有些闪光的段落。例如关于社会上对文革造反派的脸谱化，文中写道，“这种脸谱化的归类，过于简单化，无法解释一批高智商知识分子精英成为造反派、参加武斗的历史事实，也无助于让后人理解我们这个民族在探索前进方向的过程中，走过的种种曲折道路和经受过的种种牺牲和磨难”。

在提到清华武斗中遭遇不幸的同学时，文中写道：“许恭生是英才，在清华武斗中丧生的其他同学，也都是英才。他们的死，让活着的人扼腕痛心。对他们的死，我反对当时的人们将他们称之为烈士，也不同意现在的人们把他们说成愚昧的牺牲品。他们不是烈士，但是，他们也没有白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绝不是愚昧的人，他们相信了某种理想，为了自己的理想，在探求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过程中不幸身亡。无论他们所相信的理想是对是错，他们肯为自己的这种理想去作战，去面对死亡，他们的这种精神和行为，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可没有，这样的精神不可或缺。我很愿意看到，现在的青年大学生从‘中了邪的英才’中清醒过来。但是，我不希望看到，今后的大学生从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吸取反面教训，变得‘精明’，变得犬儒，一个个都成了‘范跑跑’那样的人物。”

尤其是作者提及1966年“红色八月暴力”时引用了其四十多年前一段警句——“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清除的东西，拿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左右文化大革命，是一定会断送文化大革命的”——引起我的共鸣与赞赏（当然，陆小宝校友是先知先觉，而我仅是在几十年的反思与调研后才认识到的），揭示了文革之中“走资派”及其“衙内”们反对文革否定文革的最有力之作。

然而，陆小宝校友对清华武斗的其他各方面的探究与判断，却境界不高，认识不足，且往往露出派性的马脚。

## 二、促成清华武斗的驱动力

首先，对于造成清华武斗的驱动力，陆小宝同意“流行的解释”——“武斗的实际利益趋动力是部分造反派头头的个人权力欲望”，“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之外，认为，“许多群众参加武斗，确实有着自身利益的趋动力，这就是为生存而斗争，为不当反革命而斗争”，“他们真的是害怕蒯大富上台后大搞像现在陈水扁一样的流氓政治和统治权术”。果真如此吗？蒯大富真就那么可怕？如果四一四的同学真那么注重“心中更深层的利害掂量”，何不在当初1967年五月两派大联合达成协议之后履行协议，与蒯大富站在一个阵营呢？岂不既可免除蒯的威胁，又不必冒武斗的生死之险？说到1967年五月清华两派大联合功败垂成，确实暴露了清华一些派头头的个人权利欲望，以致于出尔反尔。也正因为那次流产的大联合，促使我以及很多人从中间派转向了团派。陆小宝校友大概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太久，成天与“利害掂量”打交道，淡忘了当年追求“真理”的强大驱动力。我相信，四一四的广大同学正是因为相信真理在他们那一边，所以才不愿与蒯大富站在同一阵营，才会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参加武斗。

据我了解，团派同学参加武斗，既非沈如槐在其回忆录中污蔑的那样要把四一四“赶尽杀绝”，也从来没有认为把四一四赶出清华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团派同学参加武斗，各人可能有不

同的具体情况，但总的来说，一是认为当时清华武斗已经不可避免（四一四在加紧准备），二是认为没有中央表态，清华的问题就解决不了，而清华发生武斗，中央必会表态。

正是由于那个政治第一，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清华的两派才会自认握有真理而不肯作出政治上的妥协，夸大了政治分歧的意义。那又是我们这代人在摆脱思想桎梏的过程中经历的最初阶段——依赖救世主的阶段。所以，尽管我们知道武斗是不会斗出真理来的，但是我们期望清华的武斗事件能够震动中南海，请出“救世主”，为清华两派做出裁决。正是在这种政治分歧被无限夸大，斗争性受到极度推崇的政治环境下，清华两派对虚幻真理的追求以及对“救世主”裁决的期盼促成了清华的武斗。

所谓野心与权利欲望，以致“不正当”的利益追求，是文革时期最常见的丑化对方、污蔑对方，以致压制群众正当要求的莫须有罪名之一，经历过文革的人应该仍然记忆犹新。时至今日，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则成为全盘否定文革中促成群众造反的全部正当理由，以及权势集团继续压制群众之利益诉求的最方便的借口之一，成了庸俗化、妖魔化文革造反群众的一部分。

作为当年文革的积极参与者，我们不当接受这种庸俗化、妖魔化，不应该把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次要因素作为解释当年文革事件的总体原因。

### 三、清华文革武斗中的善恶问题

陆小宝在他做的序中提出了武斗中的善恶问题，写道：“文化革命中的这场武斗召唤出人类灵魂深处最丑恶的部分，也召唤出最高尚的部分。简直可以说，这是天使和魔鬼的共舞。但是，看了书中的事例，读者千万别以为四一四就是天使，团派都是魔鬼。事实绝非如此。其实，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凶恶和善良，每个派别组织中都有天使和魔鬼”。随后，陆小宝笔锋一转，根据工宣队时期的调查结果，列数团派在清华武斗中的种种恶行，以及团派受到“法律惩处和政治处理的人数”“多得很多”，声称“这些早已成了不争的事实”。然后，陆小宝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这两个学生群众组织的行为差别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真的老四比较善良，恶人都跑到老团那里去了？”陆小宝的答案是，在承认“阶级分析”方法的“组织成员决定论”，以及“团派受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蛊惑比四一四深，所以在文革中做的坏事也就比四一四更多”的“政治观点决定论”之外，外加他的“头头决定论”，亦即，团派头头“认准了自己的政治观点符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有恃无恐，头脑发胀，有点肆无忌惮，做事失去了基本的分寸”。

事情果真如此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陆小宝校友的上述说法不能成立。

不争的事实是，在说谎专家迟群谢静宜这类骗子主持下的工宣队制造了大量谎言与冤假错案，清华师生深受其害。多少校友（包括本人）的档案被他们塞进了“狗日的”货色，拾数年内（包括在迟谢二人倒台之后）持续贻害。比如，最近有同学告诉我，他曾听一同学告诉他，那个同学亲耳听过蒯大富“7 2 7”下令开枪打工宣队的电话录音；那个同学又说我沈某人是有人命的，开枪打死过四一四的一个女同学。那个所谓老蒯的电话录音肯定是上不了台面的伪证，否则在蒯大富遭受的世纪大审判时必会当作铁证。（注）至于本人的“命案”，幸亏团派同学多数相信“对党说实话”的原则与“坦白从宽”的政策，纷纷承担责任，化解了本人的嫌疑，否则本人只有将黑锅背到底。工宣队一手制造的清华“5 1 6”冤案，规模之大，情节之离奇，堪称清华纪录。这样的工宣队作出的所谓调查结论，难道可以全盘接受吗？

不争的事实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工宣队在审查文革问题时，把团派放在显微镜下仔细审视，而对四一四则宽松得多。比如说，尽管清华学生参与过的当时定性为“5 1 6”策划



的活动只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尽管清华四一四派参与了该次事件，工宣队抓“516”时却在团派中大抓特抓，四一四则只有个别人受审查。一紧一松，对照鲜明。

不争的事实是，清华武斗是两派的政治分歧不能达成妥协，双方的矛盾与争斗越演越烈，一步赶一步地互相逼出来的。追究哪一方挑起的武斗，既无意义也不可能弄清楚。如果说1968年四月二十四日老团进攻企图把旧电机馆建成另一个科学馆式的武斗据点的老四，是清华武斗的肇始的话，四一四在此前的武斗准备却比老团充分得多，1967年12月16日成立了以铁管为武器的清华园中第一个专业武斗班子——李文忠学习班，清华园第一个武斗据点是科学馆，1968年一月四日两派在十二号楼发生冲突，李文忠学习班初显身手即大获全胜，团派百余人被俘（见《清华文革亲历》）。六八年四月武斗发生之初，四一四方面的长矛远胜于团派临时用自来水铁管锯成斜茬口的“长矛”，直到四月二十六日八号楼战败，老团发现这种斜茬口铁管根本连棉衣都刺不进去，才开始改进长矛。同样，如果把清华武斗的升级简单地归结为四一四派从八号楼撤向科学馆时，在大礼堂受到团派阻击，情急之下扔了一颗手榴弹炸伤了团派同学而造成的，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缺乏认真反思清华武斗的诚意。其实，清华两派哪怕有一派坚持非暴力原则，武斗也不会发生。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第一、阶级斗争挂帅的年月，推崇的是暴力革命，非暴力原则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另外一个原因是占绝大多数的反对使用暴力的同学，没有坚决反对与制止极少数人的暴力倾向，以至暴力行为越演越烈，最后导致武斗。

不争的事实是，四一四中的党员、干部多，传承了更多共产党的传统，是远比团派组织严密、行事周到、深谋远虑的组织，也熟知“坦白从严，抗拒没辙”的政策底线。因此，如果说团派的恶行基本上都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四一四的恶行则尚有相当一部分深藏不漏。比如说，许恭生同学在“530”武斗中倒地被刺受伤，其中的致命伤是肝脏被刺破裂，许恭生穿的是正规刺杀服，对身体要害部分有很好的防护作用，只有挑起盔甲下部，沿着盔甲主体的下缘特意向上刺才能刺到肝脏，对一个已经倒地受伤的同学下此毒手，就已经超出了武斗的拼杀，而完全是蓄意杀害了。我相信，当时在场的四一四同学一定能感觉到下此毒手者的与众不同。再比如，北京社科院金灿等人的纪实文学《青春的浩劫》叙述的“轮奸刑”，事关重大，究竟有还是没有？然而当年在主楼的相关当事人至今不予正面回应。

因此，我认为，如果说作为个体的每个人在文革中的善恶表现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作为组织的清华两派则没有本质上的善恶差别。当然，在清华武斗中，受到团派伤害的人更多一些，团派造成的破坏也可能多一些。但这决不是“组织成员决定论”，“政治观点决定论”，或者“头头决定论”造成的。而仅仅是由于团派在物质与人力上的优势地位，在武斗中处于进攻一方造成的。实际上，在冷兵器阶段，团派虽然力量稍强，双方的伤亡大体相当（进攻方的伤亡率往往高些）。只是武斗升级后，团派在武器上获得了明显的优势，外加对于引起中南海的关注与表态的期待完全进入了走火入魔状态，天真地以为清华武斗伤亡的增加会迫使中央出面给以政治解决（忘记了1966年红八月1700多条人命也可以置之不理的前事！），造成了令人痛心不已、悔恨终身的生命损失。

“组织成员决定论”与“政治观点决定论”的荒谬，可以由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以及广西整肃422等几场屠杀事件所证明。这些屠杀事件的手段之残忍完全够得上反人类罪行，而实施者恰恰是拥有大量党团员与贫下中农等劳动阶级的群众组织，也都是文革中的政治保守派。问题是，时至早已废弃阶级斗争与阶级路线的今日，陆小宝校友仍然认同“团派中坏人较多”的莫须有说法，认同所谓阶级分析法，难道陆小宝还想复辟到那个阶级歧视与政治歧视的年月吗？陆小宝例举赵德胜的命案作为所谓的阶级报复案例，仅只是因为赵的父亲或什么亲属被共产党镇压了。陆小宝在美国居住多年，总应该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非有证据，不能因人的出身不同而加重定罪。要给赵德胜确定阶级报复的罪名，就需要赵德胜专门针对贫

下中农、工人阶级、或党员等特定人群犯罪的证据，就需要赵德胜开枪前就预先知道受害者是无产阶级出身或是党员等的证据。存在这些证据吗？赵的提前释放，就说明法院都认识到当年的判决有错，而陆小宝校友至今还津津乐道，拿着多年以前的错误当宝贝，是否也太过落伍了吧？

至于所谓的“头头决定论”，与其说团派头头“有恃无恐，头脑发胀，有点肆无忌惮，做事失去了基本的分寸”，不如说团派从头头到群众普遍缺乏政治经验，轻信了不会对文革犯的错误“秋后算账”的许诺，也缺乏社会历练，不懂的“出来混，欠债总是要还的”社会铁律，以为为了毛太祖的路线不必考虑个人后路。文革中整肃群众组织的头头常用的罪名就是“权力欲”、政治野心，是最方便的诛心论大帽子。清华两派学生组织的头头与我们一样也是普通的学生，只不过他们在某些方面或某个时刻比常人先知先觉，被文革的大潮推向了前台，担负起更多的责任罢了。他们与一般同学的关系并非“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特别是在团派这种主要依靠思想共鸣的组织内，不存在“跟着老蒯”怎么样的问题。我深信，当年清华两派的同学都是自以为紧跟毛太祖的，只不过对于毛太祖的思想意图与政治路线的理解不同，夸大了分歧，造成了只讲斗争不讲统一的对立。

#### 四、清华文革武斗与“人性为本”

陆小宝校友在他写的序中提出，“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对清华武斗和文化革命来进行历史评论”。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我们显然不应该脱离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简单地运用“人性为本”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来讨论文革问题。因为，在那个政治第一、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那个“人性”作为腐朽没落甚至反动的代名词而受到批判唾弃的年代，在那个“阶级性”成为人的最重要特质的时代，如果我们以“人性为本”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来讨论当年的历史，势必会否定当年的一切而落入目前以政治为本而全面否定文革以至否定中国的共产革命的陷阱。

我以为，作为文革的参与者，我们那一代人不可能摆脱这种政治局限性，必然会以“政治动物”为主要面目出现在当时的社会舞台上，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我们今天还原文革历史，反思文革，完全应该坚持“人性为本”，彻底与当年种种缺乏人性甚至非人性的行为决裂，不遮掩不推诿，该道歉的道歉，该忏悔的忏悔。

以“人性为本”还原文革历史，更应该充分发掘文革中稀有的人性闪光的事例，记录在册。尽管清华武斗在总体上讲违背人性，但两派的武斗参加者并非人性泯灭，多数人都在人性与“政治动物”之间苦苦挣扎。许恭生同学就是这种挣扎的典型，他在教东区团派刺杀时特意要大家只刺非要害的腿与臀部，他自己却在武斗中被刺身亡。一位老团攻上浴室房顶后受伤倒在浴室顶上，一位老四在战斗间歇中主动摸脉，然后与老团联系把受伤的老团抬了下去，足见尽管拼杀激烈，还是不想坏了对方的性命。孙华栋同学被毒打致死后，曾在老团的武斗人员内部引起不少批评，也正因有此前科，当“530”武斗结束后，西区的老团听到保卫组一些人虐待浴室被俘的四一四同学时，立即群情激愤，几至哗变。尽管这些都无法改变大局，但确实反映了武斗人员在藐视人性的政治大前提下仍然试图维护人性的挣扎，值得记录在案。

#### 五、中共当局对清华武斗的责任

正如我在“促成清华武斗的驱动力”一节中所述，清华武斗的发生是那个政治第一、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产物，是夸大政治分歧鼓吹斗争哲学的结果。而这些恰恰都是中共当局一贯宣传教育的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武斗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原因，而清华武斗只是万木丛中之一叶而已。因此，在总体上说，文革及文革之前的中共当局对清华武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里，不能不特别提到一九六六年八月红色暴力对以后文革武斗的显在影响。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色暴力是远本应为文斗的文革充斥暴力的开端，具有一种引导性的榜样作用。正因为当局对八月红色暴力的容忍，使得“革命”名义下的暴力突破了历来的政策界限，一时间对“敌人”使用暴力不但合法而且成了时髦之物。这也成为清华发生武斗的大背景之一。

清华武斗发生之前，当局的一些负责人还不时地接见清华两派的头头，试图解决清华的问题。武斗发生后，当局反而不闻不问了。要说当局完全不过问、不表态，又并非如此。“727”团派学生被逼与工宣队发生冲突造成工宣队大量伤亡后，毛太祖还不是亲自出面表了态。早知毛太祖要御体亲躬，何必当初不闻不问？难道其中又有不可告人的奥秘？无论有什么奥秘，这都充分暴露了当局的傲慢，暴露了当局忽视生命乃至草菅人命的丑陋面目。

因此，中共当局对清华武斗负有不可推卸的总体责任。

## 六、对清华文革武斗的几点反思

清华在文革中发生的百日武斗，导致十二位同学不幸丧生（另外还有五位工宣队员不幸丧生），上千人受伤，其中多人重伤致残，其他种种人性的弱点以至丑陋也屡屡发生。清华武斗不仅是我们那一带清华人心中永远的痛，也是作为全国最高学府教育培养的知识人的耻辱。我们还还原那段不堪的历史，需要自揭伤疤的勇气和承受能力，这一自找痛苦的还原过程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我们这样做，决不是为了推诿过去的错误，更不应该借机攻讦过去的对立面，而只应该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为后人留下我们以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得到的教训。因此，我们还还原历史，也就必然要伴随着我们深刻诚挚的反思。

几十年来，我无法忘却那一段惨痛的经历，更不断地进行反思，此次借写作本文的机会，加以梳理总结如下。请校友们不吝批评指正。

1、当前时代条件下的政治分歧主要是认识上的分歧，是出自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不应该夸大阶级利益的分歧，更不能夸大你死我活的对立。政治分歧的解决，应该通过分歧双方的协商妥协。在协商妥协失败的情况下，应该通过民主程序决定试行政治方案的先后秩序。

2、解决政治、经济、以及一般的社会问题（包括非暴力犯罪）应该严格遵守非暴力的原则，群众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必须严禁诉诸暴力。由于几千年来“武力出政权”的中国社会传统，中国文化中包含着不可忽视的暴力倾向，因此，在中国提倡非暴力的原则，坚持非暴力的原则，尤其重要。首先应该从政府做起，严格遵守非暴力的原则，同时严厉打击一切暴力犯罪。

3、暴力必然导致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从人性向兽性转化，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非暴力的原则，就是在必须使用暴力（例如，打击暴力犯罪，包括恐怖主义暴力犯罪以及仇恨暴力犯罪等）的情况下，也必须对暴力的使用有严格的限制与监管。

4、对于我们周围发生的暴力行为、侵犯人权的行为、或者其他违反人性的行为或事件，无论施行者是否与自己属于同一阵线，都不应该加以容忍，都不应该以犬儒主义的态度对待，而应该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尽力制止这些行为。维护别人甚至敌手的人权，也就是维护自己的人权，就是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犬儒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所批评的自由主义）倾向是中国社会向公民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克服这种倾向，必须从个人做起。

5、现在我们都知不能指望“救世主”的裁决来解决社会内部的分歧，只能依靠分歧双

方的协商妥协来解决，而妥协与协商的成果必须由双方都遵守的程序来保障。文革中的大民主最终沦为近乎无政府主义的大混乱，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确定的民主程序，或者即便制定了民主程序，但得不到有关各方的尊重，而轻易被政治理由所破坏。清华两派在一九六七年先后两次达成大联合的协议，但两次都被撕毁，不能不说与两派内部都缺乏为本派群众严格遵守的民主程序有关，因此在头头们达成协议后，由于少部分人的不满与鼓噪，就可以造成撕毁协议的后果。因此，一旦我们承认分歧各方并非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确立双方共同尊重的程序就成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 七、对反思清华文革的反思

很显然，还原文革真相与反思文革是相辅相成的两件事。没有文革真相，或者对真相的了解不多，当然不会产生全面深入地反思。而缺乏对文革客观诚挚的反思，对文革真相的还原就会蜕变成对文革真相的“过滤”，过滤出来的不是真相而是具有某种功效的颗粒或渣滓。

原“四一四”派的学生“领袖”沈如槐校友在2004年率先出版了回忆录，在清华参与文革者中开风气之先，实现了清华人回忆文革从无到有的飞跃。然而恕我直言，很显然，沈如槐校友对文革反思的境界实在不敢恭维，其回忆录中不仅仍然采用了不少谣言（其中有些应该就是在沈“领袖”领导下制造的吧），更是一口一个“蒯匪”或者“团匪”，那真是对团派恨得咬牙切齿。联想到陆小宝校友至今仍仍对“团派的坏人多”“成份差”津津乐道，难道当年“四一四”中的一些人真就拿团派当敌人看待吗？甚至至今团派的同学也不过就是“统战对象”吗？显然，他们忘记了，文革一结束，一九七七年大学第一次招生就废除了阶级路线，当然更谈不上反思了。

反思清华文革，必然离不开对“四一四”思潮与“团派思潮”做些思考与分析。

回想当年，毛太祖人尚健在，文革的大旗还被高举着，团派的头头与骨干们就已经被工宣队穷追猛打成了落水狗，尽管毛太祖批的是“必胜”保的是老蒯。

但现在看来，工宣队对团派的严厉整肃还是有其正面效果的，这个效果就是迫使团派的头头与骨干们痛定思痛，对文革以及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深刻地反思，达到新的境界。这种境界，是那些从别人被整肃中获取快感的人们无法达到的。

大概正因为此，才会在四十多年后仍有“必胜”或“已胜”的豪情快意。“四一四”思潮真的胜了吗？我看未必。

尽管毛太祖当年批的是“四一四”思潮中“打天下这不能坐天下”的观点，尽管沈如槐、陈楚三在“四一四”成立四十年的纪念文章中自诩为反对文革的“第一组织”，其实“四一四”思潮更为核心的思想是回归十七年。正如我在前文中说过的，四一四是比团派远为严密而成熟的组织，“四一四”思潮也远比“团派思潮”（如果还可以称得上思潮的话）更明确更严谨更具系统性，当然也就更成其为思潮。团派思潮其实称不上思潮，只是一种朦胧的共识，也就是出于对十七年的不满而要求改变的思想共鸣，但团派的这种思想共识从一开始就处于两难境地，又要否定十七年又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只能把否定十七年限定在文化教育领域，小心翼翼地避免重蹈湖南“省无联”的覆辙。而且，正由于“团派思潮”这种不成熟与不确定以及两难境地，我以为，如果团派真掌了权，仍然脱不了继续分裂的厄运，也就是必然落入“不断革命”的陷阱。

无论如何，清华两派围绕“四一四”思潮的辩论，为当年的清华人接受改革开放作了充分

的思想准备，无论团四，都很容易认识到，无论是十七年那一套，还是“大翻个儿”的做法，都不能继续了。

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今天对文革的反思、思想的解放，是付出了我们同学的鲜血与生命的沉重代价的。因此，我们反思文革尤其责任重大。

仅以此文献给在文革中献身的清华人。

2009 / 12 / 11 于美国南卡

注：这一说法尚未向蒯大富学长求证，此处仅以陆小宝校友下面所言推论：“蒯大富领导的武斗打死这么多人，后来把他判刑关牢的主要罪行并不及此，而是‘投靠四人帮，打倒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